

# 东汉以来内迁羌族在关中的分布研究

杨 涛

(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 陕西 延安 716000)

[摘 要] 羌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,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。从东汉开始,羌族民众开始内迁关中,到隋唐最终融入汉族。在前人研究的前提下,把民族学理论和史料相结合,使文献资料与碑石、县志材料相运用,概括羌族民众内迁关中的过程及其在关中的分布情况,并探讨了羌族在关中文化方面的遗留。

[关键词] 羌族迁徙;羌族分布

[中图分类号] K23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4-6198(2010)03-0038-03

羌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,羌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羌族早在殷商时期便见于记载,秦汉以来,随着中原王朝的扩张,羌族开始大量迁入内地,随后逐渐融入到汉族当中,推动并加速形成汉族。

羌族从开始内迁关中到最后全部融合于汉族,经过漫长的时间。但是,羌族虽然融合于汉族,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近现代关中的各县志,找到羌村。但现在的羌村与古代的羌村有很大的不同,古代的羌村多居住羌人,为羌姓村。

羌村是由于羌族人居住而形成的村落,并以羌族姓氏为其村落名。根据马长寿先生的研究,羌姓中单音的羌姓变化不多,如党氏仍为党氏,雷氏仍为雷氏。羌姓中复姓的羌姓多变为单音的姓氏,如罕井氏变为井氏,同蹄氏变为同氏或周氏,夫蒙氏变为蒙氏或马氏,钳耳氏变为王氏,等等。

羌族东迁关中,主要有雷氏、同蹄氏、夫蒙氏、党氏、钳耳氏、荔非氏、罕井氏等。现以存世的相关碑石、近现代各县志和地图,分别论述东迁关中的各羌族部落的分布。

## 一、雷氏

源于西羌族累姐部族,疑用部族名首字音为氏族称号。

《晋书·苻生载记》中记载有:“诛侍中,丞相雷弱儿及其九子,二十七孙,诸羌悉叛。弱儿,南安羌酋也。”<sup>[1]</sup>《晋书·苻丕苻登载记》记载有:“(苻)纂乃受命。于是贰县虜帅彭沛谷、屠各董成、张龙世、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,有众十余万。”<sup>[2]</sup>《晋书·姚兴载记》中记载:“兴遣其光远娥娥、立节雷星、建忠王多等

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自和宁赴援。”<sup>[3]</sup>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记载,羌族有累姐部族,疑雷氏为西羌累姐部族,以部族名首字音为氏族号,附会汉姓雷氏。

前秦建元三年(367年)的《邓太尉祠碑》中记载:“军主薄和戎雷夫龙、雷道、雷川、雷永,军录事和戎雷颜,功曹书佐和戎雷陵,军主薄宁戎雷树”<sup>[4]</sup>共七名雷姓之人。

前秦建元四年(368年)的《广武将军口产碑》中记载有:“酋大雷丘耳、雷株戾、雷上馆、雷口屠”<sup>[5]</sup>四名雷姓之人。

北魏神龟二年(519年)的《夫蒙文庆造像铭》中有:“母雷男,妻雷丰”<sup>[6]</sup>两名雷姓之人。

北魏永安二年(529年)的《雷汉王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:“祖雷支油,伯父雷汉、雷汉仁,……”<sup>[7]</sup>共八名雷姓之人。

北魏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主儒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:“邑子雷贵姬”<sup>[8]</sup>一名雷姓之人。

北魏时期的发现于澄城县赵庄乡白家河村的《造像石刻》中记载有“邑子雷口有,邑子雷清口,邑子雷口同。”<sup>[9]</sup>

《雷标等五十人造像铭》中记载有:“前将军左银青光禄淮州苻堃县令汝南郡丞假怀州刺史都督雷口,邑子雷申生、雷清光、……”<sup>[10]</sup>共四十六名雷姓之人。

西魏大统十二年(546年)的《任安保六十人佛教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邑子上书刑部令史雷口”<sup>[11]</sup>等。

西魏大统十五年(549年)的《法寿佛教造像碑》中记载有雷氏家族供养人题名22人。<sup>[12]</sup>

北周保定元年(561年)的《雷文伯造像铭》中记载有“雷

[收稿日期] 2010-02-20

[基金项目] 延安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,项目编号:YJS09-38。

[作者简介] 杨涛(1984-),男,陕西合阳人,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

文伯”<sup>[2]</sup>一人。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荔非兴度观世音造像座》中记载有雷氏多人。<sup>[4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雷显荣、雷宏达”<sup>[2]</sup>等二十八人。

北周天和元年(566年)的《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》中记载有雷氏二人。<sup>[2]</sup>

北周天和六年(571年)的《雷明香为亡夫同蹄乾炽造像记》中记载有:“雷明香、雷奉昌、……”<sup>[4]</sup>等雷姓人。

《郭口四面造像铭》中记载有“外生雷辉庆、雷广口”<sup>[2]</sup>二名雷氏之人。

隋开皇二年(582年)的《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显明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邑主雷惠祖,化主雷金相,邑子雷道晖、……”<sup>[2]</sup>共计十五人。

隋开皇四年(584年)的《钳耳神猛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猛母雷明姬”<sup>[2]</sup>。

隋开皇六年(586年)的《邑主弥姐后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北面像主雷香香,邑子雷男姐”<sup>[2]</sup>。此碑阴面下半部分被唐代乾封元年(666年)的村民改造而另有碑名,其中记载有“邑子雷师绪、雷神师”<sup>[2]</sup>。

隋代的《钳耳儒佛教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旷野将军员外司马口夫雷屈弱、义女雷明口、义息雷世口、佛弟子雷洛周、兄婁雷兴标、亡兄璋雷道猥。”<sup>[4]</sup>

耀县的《荔非朗虎造像碑座》记载有雷氏像主、邑主、香火、邑子多人。<sup>[4]</sup>

## 二、罕井氏

“罕”、“开”两种,“开”又做“井”。罕和开原来属于西羌的两个部落,由于在湟水流域相邻而居,所以被合称为罕开部落或罕井部落。在西汉初内迁被安置在天水郡,是用其种姓名称命名县名。罕、开二种后来由天水迁居到关中各地。

前秦建元四年(368年)《广武将军口产碑》中记载有“录事井裨”<sup>[2]</sup>。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,因为碑中有弥勒像主荔非道庆,所以又称《荔非道庆造像碑》。此碑中记载有:“邑子罕井景仲、罕井鲁仁、罕井僧智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罕井氏人。

北周天和元年(566年)的《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罕井法荣等六人”<sup>[2]</sup>。

## 三、同蹄氏

上党同蹄氏,又称铜鞮氏、同逵氏、同氏、逵氏。原来居住于铜鞮,羌族人也。其部族以居地名称为部族号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有“上党郡有铜鞮县。”<sup>[5]</sup>即铜鞮县在上党郡,今天的山西省沁县附近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记载有:“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,于北地召集武都参狼、上郡、西河诸杂种,众遂大盛,东犯赵、魏。”<sup>[6]</sup>另外,江统在《晋书·江统传》中的《徙戎论》中记载有东汉永初二年到五年(108—111年)的事件:“东掠赵、魏,唐突鞏关,侵及河内。”<sup>[1]</sup>滇零是西羌先零部族的别种,这次滇零率领的起义,从北地郡聚集众多杂种,东渡黄河至赵、魏大地。疑这次起义滇零率领的族人有很大一部分留居在上党

郡。所以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记载有“永初五年,复以任尚为侍御史,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,破之,诱杀降者二百余人。”<sup>[5]</sup>羊头山相聚铜鞮山不远,羊头山是任尚攻击众羌之地,铜鞮山是以滇零为首的西羌聚居之地,羊头山之羌是滇零起义余众。以同蹄为姓的西羌部族,疑以其族聚居于上党铜鞮山周围,故称为同蹄氏。聚居于铜鞮山的羌族,迁徙于河西的冯翊等地,或许与郝散在晋元康四年(294年)领导的起义有关。江统在《徙戎论》中记载“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(即今沁源县)”<sup>[1]</sup>。郝散叛变投降后余众在冯翊境内被都尉击杀。上党郡在魏晋时期为匈奴、羌、羯杂居之处,郝散率领的部中大部分是聚居此地的少数民族。河西冯翊等地的西羌同蹄氏疑即从此时开始迁入。

前秦建元四年(368年)的《广武将军口产碑》中记载有“酋大同蹄夫遮、同蹄弱谴,将军同蹄怖地”<sup>[2]</sup>。

北周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主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》记载有:“邑谓清信同蹄云口、同蹄定姜,维那清信同蹄弼弱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同蹄氏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邑主同蹄龙欢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都邑主同蹄龙欢,香火同蹄智达、同蹄由洛、同蹄僧祭、同蹄双口,……”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荔非兴度观世音造像座》中记载有同蹄氏。<sup>[3]</sup>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钳耳世标造像碑座》中记载有同蹄氏邑子。<sup>[2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的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矿业将军员外司马同蹄永,辅国将军中散别将同蹄永孙,邑子同蹄永贵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的《同蹄氏造像记》中记载有同蹄氏者八十一人。<sup>[2]</sup>

北周天和六年(571年)的《雷明香为亡夫同蹄乾炽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翁同蹄天寿,夫同蹄乾炽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同蹄氏人。

耀县的《荔非朗虎造像碑座》记载有同蹄氏维那、邑子。<sup>[4]</sup>

## 四、夫蒙氏

又称不蒙氏,为西羌大姓。姚薇元先生在《北朝胡姓考》中记载有“按古读轻唇音如重唇。夫蒙即不蒙之异议也。”<sup>[7]</sup>

前秦建元四年(368年)的《广武将军口产碑》中记载有:“酋大夫蒙木犁、夫蒙博知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夫蒙氏。

北魏神龟二年(519年)《夫蒙文庆造像铭》中记载有:“像主夫蒙文庆,父夫蒙道明,曾祖父蒙屈兰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夫蒙氏人。

北周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主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:“沙弥夫蒙僧贵,弹官清信夫蒙妙朱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夫蒙氏人。

北周天和六年(571年)的《雷明香为亡夫同蹄乾炽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姑夫蒙俗男,女夫夫蒙双养、夫蒙贵庆,外孙夫蒙荣姬。”<sup>[2]</sup>

隋开皇四年(584年)的《钳耳神猛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亡姑夫平望夫蒙钟拔,亡女夫蒙容女、夫蒙女口。”<sup>[2]</sup>

## 五、党氏



出自西羌族。

前秦建元三年(367年)的《邓太尉祠碑》中记载有“军录事和戎党陆,军主薄宁戎党共,军录事宁戎党投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魏神龟二年(519年)的《夫蒙文庆造像铭》有“(祖父)妻党口口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主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邑主清信党姬娥、亡唯那清信党姬香,邑子党俗男,邑子清信党享口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的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党姓七人。<sup>[2]</sup>

北周建德元年(572年)的《邑子党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党口口,县主薄党定昌。”<sup>[2]</sup>

隋开皇四年(584年)的《钳耳神猛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神猛妻党神妃,(子)妻党晖容。”<sup>[2]</sup>

## 六、钳耳氏

西羌虔人部族人,由于钳耳的音和虔人的音相近,所以虔人部族迁入内地后称为钳耳氏。

前秦建元三年(367年)《邓太尉祠碑》中记载有:“军参事和戎钳耳口、钳耳口龙,军门下督和戎钳耳引、钳耳世虎,军功曹和戎钳耳匡当、钳耳世兴。”<sup>[2]</sup>

发现于澄城县赵庄乡白家河村的北魏时期的《造像石刻》中记载有“宁远将军右员外散骑常侍邑子钳耳硕口,邑子钳耳口真,邑子辅国将军特钳耳庆口,邑子钳耳万相、邑子钳耳丑奴,邑子钳耳法畅,邑子钳耳胃口,邑子钳耳贵庆,邑子钳耳周孙,邑子钳耳定生,邑子钳耳元口。”<sup>[3]</sup>

北周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子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邑子清信钳耳支诚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荔非兴度观世音造像座》中记载有钳耳氏。<sup>[4]</sup>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钳耳世标造像座碑》中记载有“钳耳氏像都檀主、像檀主、邑主、化主、都花主等。”<sup>[4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的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钳耳氏一人。<sup>[2]</sup>

隋开皇二年(582年)的《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显明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邑子钳耳晖遯。”<sup>[2]</sup>

隋开皇四年(584年)的《钳耳神猛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钳耳神猛,息钳耳方贵,息钳耳遵略,像主亡姑钳耳女休。”<sup>[2]</sup>

隋代的《钳耳儒佛教造像碑》记有“像主清信女钳耳儒、兴门钳耳口妃。”<sup>[4]</sup>

北朝的《吕村钳耳氏残碑》中记载有“钳耳显和、乡老钳耳寿郎、乡老钳耳客奴。”<sup>[4]</sup>

耀县的《荔非朗虎造像碑座》记载有钳耳氏像主、邑子等。<sup>[4]</sup>

## 七、荔非氏

西羌族人。

前秦建元三年(367年)的《邓太尉祠碑》中记载有“军功曹书佐宁戎利非阆、利非永达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魏年间的《荔非周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:“邑口荔非周欢马、邑主荔非侍郎马,……”<sup>[4]</sup>等荔非氏人。

北魏永熙二年(533年)的《邑主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

等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邑子荔非贵姬。”<sup>[2]</sup>

西魏大统十二年(546年)的《任安保六十人佛教造像碑》中记载有:“郡口口永宁令口州府主簿荔非郎虎,……”<sup>[4]</sup>等荔非氏人。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荔非兴度观世音造像座》中记载有“荔非胡仁,荔非兴度。”<sup>[4]</sup>

北周保定二年(562年)的《邑主同蹄龙欢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邑子荔非景晖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保定四年(564年)的《圣母寺四面造像碑》中记载有“威列将军荔非道庆,邑子荔非社奴,荔非仕明”<sup>[2]</sup>三人。

北周天和元年(566年)的《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》中记载有荔非氏五人。<sup>[2]</sup>

北周天和六年(571年)的《雷明香为亡夫同蹄乾炽造像记》中记载有“清信士荔非沙女。”<sup>[2]</sup>

北周年间的《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题名》中记载有“都花主荔非明达,典录袁公记室荔非口口,……”<sup>[2]</sup>等荔非氏人。

彬县的北魏羌族十人造像碑中记有“口口口非伏生,口口荔非豆郎,……”<sup>[8]</sup>等荔非氏人。

耀县的《荔非郎虎造像碑座》中记载有“州令舟州府主簿淮州显口县令荔非郎虎”<sup>[4]</sup>。

羌族的内迁关中,加速并最终完成了羌汉的民族融合。

内迁关中的羌族,导致羌族居住地的变化,促进了羌汉两族之间的交往,同时二者经济文化交流增多,促进了羌族的封建化和羌族的汉化。

羌族内迁关中,打破并瓦解了羌族部族制度。内迁关中的羌人,他们与汉族民众杂处相居,政治上受到政府郡县的管理。由于他们经过战争而多次迁徙,虽然保留部分部族制度,但原有部族制度却已开始瓦解。羌族民众融入到汉族的生产生活中,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羌族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迁徙前的羌族民众,一支以原始的畜牧业为主,社会经济非常落后。直到爰剑时期,羌族民众开始了农耕生活,但仍以畜牧业为主。羌族民众内迁到关中后,开始接受周围汉人先进的农耕技术进行农业生产,逐渐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耕作方式。这一方面促进了羌族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,另一方面又和汉族民众一起开发了关中地区的土地,促进了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唐·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] 马长寿.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[M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3] 王西平,张进忠.澄城碑石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0.
- [4] 陕西省文物普查队.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[J].考古与文物,1994,2.
- [5] 汉·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6] 宋·范晔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- [7] 姚薇元.北朝胡姓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8] 李崧.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[J].中国道教,1994,3.